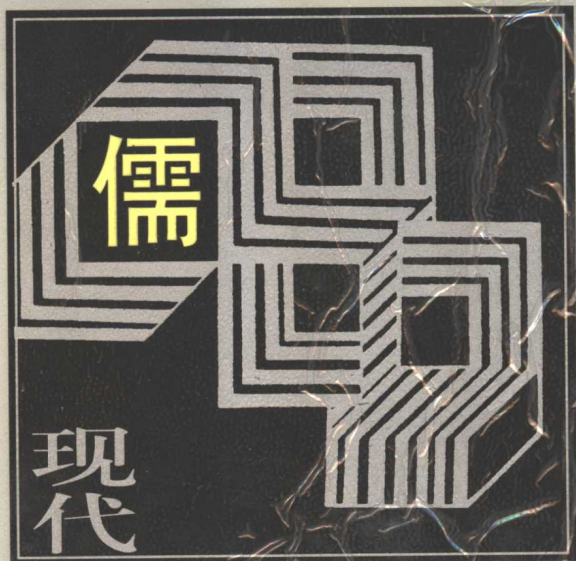




宋志明 著

贺麟 新儒学思想研究

xian dai xin ru xue



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 李锦全 主编

责任编辑：盛家林
装帧设计：刘丰杰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 儒 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



宋志明 著

方克立 李锦全 主编

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

宋志明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4 插页 205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863-4

B·97 定 价:19.00 元

丛书主编的话

这是一套以现代新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丛书。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学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七十年来它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的学脉和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就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而言），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很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前期发展，贺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论著中已经作过初步的清理和总结。现代“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等概念就是贺先生最先明确提出来的。

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学宗师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港台继续大力推进新儒学运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2年，美籍华裔学者张灏写成《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最早刊出于

1976年出版的英文论著《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中）一文，开始从总体上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对新儒学进行反省的，但并不只是简单的批评与否定。同样站在自由主义立场的台湾学者韦政通，这一年也撰有《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一文，对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观念进行了批判的审视。把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专门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学术工作，在港台、海外可以说从七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起步要晚得多。八十年代中期，杜维明等海外华裔学者大力宣传“复兴儒学”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在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大陆学界才对现代新儒学（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它在港台和海外的发 展）逐渐有所接触和了解，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1986年11月，“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对这项研究工作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课题组成员不得不从搜集、阅读最基本的图书资料开始，包括几代新儒家学者的著作和海内外的有关研究资料，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在“七五”期间完成的一项主要工程就是编撰《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同时编辑出版了一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共十五册），首先把克服种种困难多方搜集来的基本资料加以初步整理，比较系统地介绍给国内的读者。研究工作是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在过去几年里，课题组成员除了已经出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现代新儒家研究》（宋志明）、《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冯友兰新理学研究》（田文军）等几部专著外，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近二百篇论文（包括收入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集中的文章)。这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完全隔膜的情况，而且引起了港台、海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甚至连新儒家学者也惊异地发现：“有些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却先做了”，并以“我们也要加紧做，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自励。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因此而有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撰著和出版一套包括专人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系列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是课题组下一步研究工作所要达致的目标。专人研究系列是对第一、二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新儒学思想，分别进行系统地研究和评述，重点是研究他们的古今、中西文化观和哲学、宗教、伦理思想；对于那些活跃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则需同时注意研究他们的现代儒家政治思想。总之，既要揭示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共性，也要写出每个人思想的个性。专题研究系列是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别专门研究，例如对其哲学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宗教观、伦理观、人生哲学、文化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等等，运用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和阐论。又如对现代新儒学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学说的承继渊源关系或对立互动关系，分别加以系统地考察，也可以作为专题研究的内容。这两个系列的论著都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加强理论分析，总结对现实有启迪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写成和出版，能把国内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承担《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写作任务的，大部分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有的还是在读博士生（他们承担的研究课题往往就是他们的博士论文选

题)。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锐敏，勇于开拓进取，富有探索精神，所以这一批研究成果大都各有创新见解，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所有作者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基本上达到了上述两个要求。但是也不必讳言，由于各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识水平不同，研究能力和所下的功夫不同，各册论著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地方，甚至错误失当的地方，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恳切地期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让这套丛书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锻炼造就一代学术新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和辽宁大学出版社分别承担了本丛书的专门研究系列和专题研究系列的出版任务，给我们的工作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方克立 李锦全

1991年12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	(1)
一	清华学子	(1)
二	负笈欧美	(7)
三	执教北大	(18)
四	最后的抉择	(28)
第二章	华化西学觅玄珠	(33)
一	文化的体和用	(33)
二	中西哲学的异同	(39)
三	斯宾诺莎与中国哲学	(43)
四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	(47)
五	鲁一士与中国哲学	(59)
六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68)
第三章	深研国学求新解	(87)
一	杨墨的新评价	(87)
二	诸葛亮新探讨	(94)
三	王安石新阐释	(100)
四	宋明理学的新评价	(111)
五	朱熹评说	(117)
六	陆九渊评说	(125)

七	王阳明评说	(129)
八	王夫之哲学思想研究	(137)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哲学述评	(149)
一	中国哲学的近代走向	(149)
二	西方哲学的输入与融会	(157)
三	孙中山哲学新解	(164)
四	时代思潮的疏理与前瞻	(177)
第五章	竖起新心学旗帜	(189)
一	展望儒学的新开展	(189)
二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总结	(197)
三	创建新心学体系	(216)
第六章	逻辑主体论：心理合一	(221)
一	唯心论的哲学识度	(221)
二	合心而言实在	(223)
三	合理而言实在	(228)
四	合价值而言实在	(239)
第七章	思想方法论：直觉、逻辑与辩证法	(247)
一	直觉的方法	(247)
二	逻辑的方法	(252)
三	辩证法	(259)
第八章	意识现象学：自然的知行合一	(269)
一	“知行同是活动”	(269)
二	“知行永远合一”	(272)
三	“知主行从”	(276)
第九章	儒者人格新论：理、欲、势合一	(279)
一	重塑儒者形象	(280)

二 合理性	(281)
三 合人情	(289)
四 合时代	(295)
后记	(303)

第一章 一架书里

走遍古今中外

一、清华学子

1902年9月20日，在四川省金堂县五凤乡一个耕读传家的乡绅之家，一个男婴“哇”的一声来到了世间。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新儒学大师、哲学史家贺麟（1902-1992）。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的仁兽，象征着祥瑞。父亲用“麟”作为自己爱子的名字，希望他给家族带来好运，儿子长大以后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与“麟”相配，父亲给儿子定的字为“自昭”。贺麟的父亲是一位秀才，主持过乡里与县里的学政。祖上留下了一些田产，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贺家家境较为殷实，衣食无忧，父亲又是一位读书人，这对于贺麟的成长无疑是个得天独厚的好条件。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8岁入私塾启蒙识字，从《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读起，一直读到四书五经。“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①也许正是由于童

^①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第376页。

年时代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教化，为他的心灵深深打上儒家的烙印，致使他学成之后，终于以儒学为正宗，走上了现代新儒家的道路。少年时代的贺麟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因而他既在私塾中受过旧式的训练，又在新式的学校中受过现代的教育。13岁那年，他读完小学。因他身材矮小，身体较弱，父亲和母亲不放心他独自到外地读书，遂命他自修两年。1917年，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入四川省有名的省立成都联中——石室中学。他收拾行装，告别养育他的小村庄，来到省城成都，开始了独立求学的的生活。

贺麟在中学时代就很有主见。他认为，为人治学应该以义理之学为本，以词章经济为用，“哲学应当与文化陶养、生活体验相结合”。^① 这种看法同宋明理学家很接近。他很看重心性之学、为己之学，而不甚看重事功之学，这也许可以视为他新儒学思想的滥觞吧！贺麟求学的时代已不能跟宋明时代同日而语了。西方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长久封闭着的大门，曾经以“天朝大国”傲视东方的中国竟然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残酷的现实改变着知识界的学术价值观，人们开始倾心于事功之学，而对心性之学不屑于顾。可是，贺麟却不为时尚所动，认准了自己选择的治学方向。他的老师曾鼓励他作一个有为的青年，而他则表示，自己的志趣是“平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从此，他立下志向：一心一意地作学问，要成为一个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哲学家；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要领会最杰出的思想，要以古今中外的哲人为友，决不虚度此生。在初中时代，他以这一指导思想安排

①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第376页。

自己的学习。他偏爱文科，对理科不甚感兴趣，学习成绩最突出的是国文课，老师夸奖他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他喜欢结交一些好学上进的朋友，经常在一起长跑、打球、游泳、谈心。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锤炼体魄，增长见识，都表示决不能虚度年华。

1919年，贺麟初中毕业后考入赫赫有名的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清华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为清华学校）是现今清华大学的前身，建于1911年。这是外交部利用美国“退还庚款”办的特殊学校，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新生先读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毕业时达到大学一二年级程度，然后到美国的大学继续学习，获取学位。清华的名气很大，当时有“古有翰林院，今有清华园”的说法。在这所学校里荟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能考取这样的学校，对于贺麟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起点。在清华，他接受欧美式的现代教育。英文是一门主干课，他每天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记单词，背课文，进行读、听、写、译练习。此外，他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所谓“人文科学”，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美国历史、英国文学、西方文化、第二外国语等课程。这样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学习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华学堂虽以“西学”为主，但也不忽略中学。为了开展关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该校设有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流学者，担任国学研究所的导师，致力于培养从事国学研究的人才。梁启超给同学们讲授“国学小史”，开始选这门课的人有二百多人，其中

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并没有真正听进去，最后只剩下贺麟等五名学生。贺麟倒是越学越有兴趣，听课十分认真，课后还找一些参考书阅读。他还听过梁启超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会上讲中国文学。梁启超一连讲了六七次，从屈原讲到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诗、词、赋无不涉及，边讲边背，如数家珍。贺麟听后佩服极了，深为老师渊博的学识所倾倒。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拿着一纸书单到梁启超的寓所求教，希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梁启超热情地接待了他，建议他多读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书。为了帮助他找到进入戴震思想体系的门径，梁启超特地借给他一套戴震的弟子焦循（字理堂）的著作《雕菰楼文集》，要他回去认真研读。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贺麟迈入中国学术研究的殿堂。他不负师望，很快写出学术论文《戴东原研究指南》（发表在1923年12月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和《博大精深的焦理堂》。这大概是他学术研究方面的处女作。

贺麟酷爱学术，但并不是那种只会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书虫子。他也愿意走出校园到大自然中去陶冶情操。在1920年的暑假，他随着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开展集体活动。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独自一人来到荷花池畔，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欣赏着美丽可爱的大自然，体会着“此中有真意”的意境。看着，看着，诗兴大发，他留下这样一首新体诗：

我在池边坐着，
将圆未圆的月儿在树梢头照着，
将开未开的荷花在月下映着，
柳条微微地摆动，
雀儿也歌唱着，

不是池里的鱼儿乒蹦翻动，

惊我一跳，

我还忘了我在池边坐着。

他勾勒的这幅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图画，不正是儒家孜孜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吗？他的诗句与程明道“绿满窗前草不除”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此可见，贺麟真情向学的心学倾向，已略见端倪。

如果说梁启超把贺麟领入中国学术的殿堂，那么，吴宓则为他开出西方学术的新天地。吴宓精通西方文学，是一位以译西方文学作品而闻名的翻译家。他以西学为专长，却倾心于国学。他曾担任文化保守主义气味很浓的《学衡》杂志的主编，1924年到清华国学研究所担任主任之职。在贺麟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吴宓教授首次为高年级开设选修课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与技巧。英文一向很好的贺麟选了这门课，从而亲炙于吴宓门下。同学这门课还有陈铨与张荫麟。他们三人都偏爱文科，志趣相投，结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陈铨后来成了文学家，而张荫麟成了哲学史家。选修翻译课虽然只有三名同学，吴教授还是照开不误。他们三人学习这门课都相当努力，成绩提高很快，被同学们称为“吴门三杰”。在吴宓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他曾写过一篇专论，题为《严复的翻译》，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49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严复的翻译技巧及特色，高度评价严复的“信、达、雅”之论，同时阐述自己关于翻译的对象及标准等问题的看法。在清华的教授中，对贺麟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吴宓了。正是在吴宓的影响下，他才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

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①后来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把斯宾诺莎、黑格尔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专著译成了中文。离开清华之后，贺麟始终同吴宓教授保持着半师半友的关系。贺麟临毕业之前到吴宓教授家辞行，吴宓为他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其中有“学派渊源一统贵，真理剖析万事基”之句，贺麟牢记在心，奉为治学的座右铭。1989年，贺麟在《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一书的《新版序》中写道：“吴宓老师（1893—1978）逝世已八年，这个册子的再版，表明我对他的怀念。”于此可见他对吴宓老师所怀感情之深。

在清华学习期间，贺麟对社会活动也很热心。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选他担任一班之长，四年级时曾一度当选为级长。到清华的第二年，贺麟就被校刊《平民周刊》看好，聘请他作编辑部的编辑。到高年级，他曾担任校刊《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他在课余时间花费许多时间组稿、审稿、编稿，工作非常认真。他居然能想办法约请到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家大师为《清华周刊》写稿，竟把一份校刊办得学术气味十足。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开枪屠杀示威群众，造成“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暴发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有名的“五卅运动”。贺麟勇敢地投身到反帝斗争洪流之中，参加清华“沪案后援团”，并且担任两个宣讲人之一。他放弃暑假休息时间，前往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城进行鼓动宣传，接触劳苦大众。在火车上，他读完了孙中山先生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深深地为孙中山的思想所打动，

^①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第376页。

表示服膺三民主义。这种政治信仰他保持了几十年之久。通过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贺麟进一步养成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入世精神。他后来虽没有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而成为一名学者，但他的论著中往往透出对时事政局的关注。

1926年夏季，贺麟完成了在清华的学业。他的文科成绩优秀，其它学科多为中等或及格，平均成绩为中等。他的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曾住过三次医院，再加上社会活动较多和主观上的原因，使他的学习成绩受到一定影响。但他在课外的收获比课内大得多，这是无法用分数衡量的。依照清华的惯例，他的好友张荫麟临毕业前为他写了一份小传，刊载在毕业年刊上。张对他的评价是“生于诗人之乡，下笔而斐然成章。态度温和，宽厚有容，注重直觉，相信权威。”张荫麟和陈铨作为贺麟的挚友，在肯定他的人品和学问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他的缺点，主要有“心思太杂多外骛”、“有虚荣心”、“主张不贯彻”、“做事不快效率不高”等十条。朋友们的诤言使他颇受感动。

就要告别清华了，三位好朋友互道珍重。经过七年的学习，他们已长大成人了，已意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重任：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他们的共同感受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要被别的民族轻视。”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贺麟继续走在求学之路上。1926年8月，他告别亲友，乘一艘美国客轮，驶向太平洋彼岸。

二、负笈欧美

1926年9月，贺麟插入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继